

从《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谈吕叔湘先生的 社会责任感

报告人：张伯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郭继懋教授（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吕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18 年了，这些年来我也经常想起他，尤其是在今天纪念《语法修辞讲话》60 周年这样一个重要日子里，我们更加地怀念他生前的业绩。这么多年过去了，语言研究在吕先生、朱先生开拓的方向上走了这么远的路，我本人也是参与者，对学术方面的体验也逐渐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想起来，经常反思，想想吕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究竟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学术遗产，尤其是 2004 年纪念吕先生的百年诞辰的时候，媒体采访到我，问我对吕先生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直到他离世我都不是体会很多，直到 2004 年我编辑吕先生的传记，才发现对他的学术境界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很愿意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在这些方面对吕先生的了解和我自己的体会。

吕先生一生很多重要的转折点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语法修辞讲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解放初期，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要纠正公文文书中的语言文字缺点，责成中宣部的胡乔木同志弄出一些具体的措施，胡乔木找到了权威的语言研究机构，希望他们写一部讲语法规范的书，没想到给回了。叶圣陶叶老当时是教育部的副部长，他就主动地向乔木同志推荐了吕先生，他说有一位吕叔湘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保证他可以做好。叶老就请吕先生和乔木同

志见了面，把中央意图说了，吕先生想了想说可以答应。乔木同志问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吕先生说我只提三点：第一个，我希望你们能给我提供一些素材，比如说报纸杂志、政府公文、大中学生的作文，那时候材料并不易得，不像现在网上一搜就全有；第二呢，当时吕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说我在清华大学想找一位助手帮着我做；第三，要求在两三个月内完成，时间这么紧，我们两个人的课时适当地减一点。乔木同志说这都没问题。有的学者，当时可能是出于明哲保身吧，很明白这件事情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就拒绝了这项任务。我觉得这是吕先生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他，他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语法修辞讲话》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和朱先生就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本书的深远影响。吕先生给我讲这事的时候讲得很轻松，我听着却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一个学者，把自己闷在书斋里面，固然可以做很深厚的学问，但是你怎么看待你这个学问在社会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愿不愿意同时用你的学问来影响一般民众，我觉得这是有境界的差异的。

这件事，主要是叶老的推荐，为什么叶老敢这样推荐呢？这得自于两位老先生的渊源。他们两个人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认识的。我想要讲一讲我所得知的他们最早的相识，到叶老怎么成为影响吕先生一生的人。吕先生自己也说，如果没有叶老，他对学术境界的认识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转变。吕先生 1938 年提前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回国，先在云南大学，1940 年到成都华西大学工作。华西大学出了很多响当当的人物。吕叔湘当时 40 多岁，也是其中的一个顶尖的人物，他在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里边主要做历史语法的专题研究。现在我们从吕先生的论文集里边一翻开就是那几篇文章，吕先生近代汉语研究最重要的几篇，都是在华西完成的。这里就发生了一个故事，1941 年年初，一个春天的早晨，叶圣陶敲开了他们家的门。叶圣陶当时是四川省文化厅的厅长，主持四川省的语文教学，为了提高中学语文教师全面的素养，他想推出三部书，一部精读指导，一部泛读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伯江教授做主旨报告



与会者在科研楼前的合影

一部文法指导。其中这部文法书，叶老邀请吕先生写。吕先生用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中国文法要略》写出来了，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当时这部书是叶老为了中学语文教学，为了提高中学语文教师的素养而倡议编写的。吕先生通过这个事情和实践慢慢理解了叶老的思想，在叶老去世以后，吕先生写的怀念的文章里边说，如果没有那天他来找我，我可能学术思想上不会有这种转变，从那时才知道学术的普及工作，不仅不是第二流的工作，跟学术研究一样的重要。吕先生写这部书，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还挨批了，当时研究所负责人的观念就是大学者不能写通俗的东西，必须写专而又专、深而又深的东西。吕先生在叶老先生的影响下，发生了这一生认识上的重大转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作为学术界的领袖，以自己的学养和眼光引领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忽略初等教育的投入，比如在开明书店编了一些国文读本等等。

我再说一件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事情。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结束了，这些老先生从干校回来纷纷聚首，都有谁不在了，大家在一起唏嘘一番，很多老先生都心灰意冷。在 1976 年底吕先生得到一份很好的宣纸，请叶老题字，1977 年初叶老就写好了，是两首诗：“华西初访犹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沉殊弗逮，愧存虚愿欲齐贤。”这是说他们四十年的交谊；“并臻信达兼今雅，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俾因椽笔得深尝。”叶老的意思是，你翻译小说的出色成就我是知道的，真正是信达雅，叶老

说你不如用你的精力来多翻译文学名著。可是这一回吕先生没有听叶老的。因为吕先生心里有放不下的心结，他从年轻时起就为祖国文化事业的振兴而努力，可以说一生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短短的十年“文革”又遭到了全面的破坏，他为此痛心疾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77 年“文革”结束后那十来年里，他不仅参加了语言学界众多的学术会议，也参加了大量的语文教学方面的会议，中小学语文教学体系的拟定等，到处奔走，“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就是他和王力先生大力支持才推广开的。他一直在这两条线上奔走，一方面关注全民的教育，语文普及；另一方面完成他在语言学界的使命。我觉得从他和叶老几十年的交往的侧面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境界是什么样，所以纪念吕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江蓝生先生称他为“人民的语言学家”。

《语法修辞讲话》凝聚了两位老先生当时对汉语语法理解，吕先生也常常嘱咐我们，只有把语法规律研究透了，才能拿出来指导实际语言应用。所以我们觉得一方面不能忽视对学术普及方面的重视；另一方面，作为专业研究人员，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好。我本来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论文，可能没有时间细说了，简单向大家报告一下。

吕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里讨论“这、那”的时候曾经提出“转称称代”和“直接称代”两个概念，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汉语的“这+量+名”格式也存在吕先生在讨论称代问题时所指出的两种语义的区别。我的文章认为，这个现象反映的是汉语没有定冠词所带来的结果。汉语没有定冠词，定冠词的功能常常是靠指示词实现的。与英语定冠词用法相应的语法成分中，量词是个关键。汉语的指示词不可能离开量词而发展为定冠词，“指+量”是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这也是受吕先生在语法研究上重视英汉对比、提倡方言语法观察的影响得到的一点发现，我想也是有助于汉语教学的实际应用的。我们在研究所里边长年累月地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越做就越体会到吕先生当初告诫我们的，理论问题解决得越好，你去给人家做普及的时候，你的说服力也就越强。所以我今天来用这个题目参加会议也是表示对前辈学者的敬意。①②

(文稿根据速录整理而成)



各分会场小组讨论情形